

國士典型陳布雷

自幼挺異年輕秀才

陳布雷先生，始終以文章報國，爲蔣公中正所倚重。

他在蔣公幕府，司文字之役，平章國事，垂廿年之久。終以憂國傷時，油盡燈枯，于民國卅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十一月十三日仰藥殉國。感激輕生，振風俗世。蔣公痛悼之餘，曾以「當代完人」輓之。茲特簡介其平生。

陳布雷，浙江慈谿人，名訓恩，字彥及，號畏壘；生于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。

自幼聰慧，六歲讀書，十歲即習作文；十三歲習作詩，成「秋日苦雨」一絕云：

「遊子浮雲夢不成，挑燈獨坐夜淒清；明朝欲向橫塘路，大雨瀟瀟久未晴。」

十四歲在三士市董家就外傳，董家子咸、子宜兄弟輕財好賓客，當地有志改革之士，常常在他家集會，陳布雷除了勤讀經書和漢魏唐宋文章，習作四書五經義理外；並且就董家豐富的藏書中，多所瀏覽，尤喜披閱「新民叢報」、「新小說」、「警鐘報」、「浙江潮」等新思潮刊物。因此，學識日充，新智開啓。

光緒廿九年（一九〇三年）十月，奉父命入慈谿縣城就童子試；他不願意，但又不敢違抗。因為草草交卷，成績很差，竟然名列榜尾。家人引為恥辱，他自己也懊喪後悔。從此不再去董家，而在家閉門思過，誓雪前恥。

一月再應府試，却能名列前茅，高居榜首。遂隨父買舟冒雪歸家。中途過父執輩孫以文家，孫勉勵他說：

「你這次所以能躍登榜首，係因縣試失敗所激；凡事不患蹉跌，患不能自奮。」

他感奮之餘，次年再赴寧波應院試，又高中第五名秀才。當時他才十五歲，比黃膺白（鄂）十七歲中秀才還早兩年，非常難得。

隨後，他偕三弟訓懋入慈谿縣中學堂肄業，校中規定每週作文一篇，列最優等者記功二次，優等記功一次。凡學業成績每積一功，獎銀幣二角；縣令親課時，最優可得二圓。他因為作文優異，半年之內，和他三弟一共累積獎金達廿一圓之多。暑假全數孝奉母親。母親一面為他們的優良成績高興，同時也嘉許他們能夠克制儉約，不亂花錢。

十七歲，轉入寧波府中學堂肄業，校中新生舊生各卅餘人，形成兩派。某日，同學會開大會，新生相約以「學生新道德」為題，糾正同學的腐化生活，陳布雷當眾演說，辭色嚴厲；得罪了舊學生，引起一大風潮。結果，他被迫自請退學，風潮始平。

休息半年，由張葆靈的大力推荐，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學校預科，插班二年後，自此，生活爲之改變，不再沉迷小說家言；而頗覺讀書之樂，尤喜涉獵文學史地方面的筆記小冊，對他以後的文筆雋永，關係不小。

十九歲那年四月，杭州各校舉行聯合運動會，他在會場担任新聞編輯，油印分發，是爲他練習新聞事業的開始。

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年），他廿一歲了，春初，赴杭州入府學，經過上海，當時他的堂兄陳訓正（吧懷）創辦「天鐸報」，他寄寓數日，聞見益見恢廓，並且開始歎羨記者生活。

爲了「鐵道國有」問題，他曾經有致楊度一書，寄洪佛矢先生教正；洪大爲贊許，一面刊載「天鐸報」一面勉勵他課餘之暇，多寫文章投寄報館。牛刀小試，即使他傾向新聞事業，也因此開啓了他的撰述生涯。

如椽巨筆志在世道

宣統三年（一九一一年）（辛亥）春，陳布雷經過上海，留寓十天，恰巧「天鐸報」的編輯戴季陶結婚請假，請他代理。

陳布雷每日爲「天鐸報」撰短評二則，間亦代撰論說，初爲新聞記者，一杯龍井茶，一把熱手巾，喝

茶措臉，不覺文思泉湧，下筆千言。

夏天，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，遂正式就職「天鐸報」，每日撰短評二則，十日撰社論三篇，署名「布雷」。

他之所以取名「布雷」，還有段風趣的小史。原來他在浙江高等學堂肄業時，面頰豐潤，同學輩給他起個「麵包孩兒」的外號。麵包英文叫（Bread），再用譯音而成爲「布雷」。他用此筆名，不但紀念當年一番風雅趣事，且亦含有「布鼓雷門」之義。

宣統年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義。上海各報，不敢得罪清廷，多稱爲「逆軍」。「天鐸報」却傾向革命，稱爲「革軍」，囑陳布雷多作論說。他乃乘機作「談鄂」長文十篇，連日刊載，聲援革命軍。

他在「天鐸報」任事五個月，酬薄事多（每月僅四十元），祇爲興趣關係，並未計較。然而鋒芒顯露，不自斂抑，漸爲總編輯李懷霜所忌，對他再三杯葛。他知不可再留，於是就辭職回家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，他開始在寧波「效實中學」任教，課程簡易，頗多閒暇，加以他的興趣，仍在新聞事業；所以常常閱覽英法文書報；並且每三天譯稿一篇，寄登上海「申報」，署名「彥」。是年三月，加入同盟會寧波支部爲會員。

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六月，他的父親去世了，弟妹衆多。他有弟五人，最大十四歲，最小四歲；妹四人，最大廿歲，最小才滿月。於是他遵從他父親的遺命，辭去學校職務，在家綜理家務以及宗族鄉黨

的公益事項；當時，他才廿五歲。

後二年夏，「效實中學」校長何旋卿辭職，學會同仁推舉他接任，辭不允，又不能經常離家。於是祇允担任名義，每週去上課五小時，實際校務，由副校長負責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年）他的夫人因生產去世，他悲痛逾恆，將家事及子女托親屬照料；于次年離家赴寧波，一面在「效實中學」任教，一面兼任「四明日報」撰述。每天撰短評一二則，隨感錄六七百字。當時即有人欣賞他的文字，認為「思想筆墨，均為海內報紙所少見。」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，他的堂兄訓正與湯節之發起創辦「商報」於上海，約他為編輯主任，編輯部同仁尚有潘公展、潘史生等人。他和二潘夙夜孜孜，以充實內容改良版面為急務。他每週撰評論五篇，星期日撰短評一篇，文辭言論，為各方所重視。有一次為了山東交涉問題，與「中華新報」反覆辯論；該報主筆張季鸞（一葦）頗贊許商報文章，但不知何人手筆，輾轉詢問，才知陳布雷與潘公展之名，特為專誠訪談，訂為知交。

由於「商報」站在同情與贊助國民革命的立場，社論尤具力量，漸為中國共產黨人所注意，常轉載其文章於「嚮導周刊」中，加以評註；並且對他與潘公展等多所拉攏。他和潘公展等始終堅持全民革命的立場，不贊成階級革命；不為所誘。於是中共黨人轉而攻擊他們為「小資產階級意識濃厚的分子，言論不够澈底。」

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年）邵力子奉國民黨命自廣州赴上海，宴約報界，說明革命局勢；並攜有蔣中正先生親自簽名的小影贈送陳布雷，轉達蔣先生對他非常仰慕之意。八月，他患傷寒重病，疲頓殊甚。北平交通界聞人葉恭綽特別寄贈醫藥費三百銀元，且道相慕相念之深。某次葉恭綽由北平赴上海，向友人表示：「全國報界中主持社論之人才，寥寥不多得，其議論周延，文字雅俊者，在北惟顏旨微，南惟陳畏壘而已」。

陳布雷自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起，在商報發表的社論，開始署名「畏壘」。

當時上海的有識之士，除了披閱新報之外；非翻閱「商報」，看看當天「畏壘」又做什麼文章不可。許多學者專家欽服陳布雷在「商報」所撰寫的社論，認為他的言論之流暢與鞭撻入理，真是擲地有金石聲。認為他是民國以來，在言論上最有特殊成就的名記者，他的成功，不僅在言論，還在他的行動與行為上。他是位剛健堅強的人，明辨是非不作鄉愿；他志在挽救世道人心，而不在個人的升沉得失。十五年冬，國民革命軍已克復湖北、江西等地，蔣總司令駐節南昌，特地邀請他和潘公展赴南昌一會；從此，他由報人逐漸的步上從政的階梯。

書生從政澤惠地方

他和潘公展于民國十六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初抵達南昌，先見張靜江，再謁蔣總司令，談到北伐局勢，

人心趨向，以及如何收攬黨外人心。又二日，再約談，蔣公堅勸他們參加國民黨，嘗謂：「君等在精神上早爲本黨同志，入黨與否，本無關係；然國民救國爲人生天職，加入則力量更有發揮之處也。」

當年二月，他以蔣公及陳果夫的介紹，參加中國國民黨，隸中央組織部的直屬區分部，遷入總司令部西花廳居住，與張羣、黃郛爲鄰。蔣公每三四日必召見談話，命他代擬文字，對他相當禮重。四月，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約他赴杭州任省政府祕書長，六月，赴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。八月，蔣總司令爲促進寧漢團結，繼續北伐，毅然辭職離京。他也於當月十八日辭職離京，返家小住。

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一月，蔣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問他擬就何職？他表示：「願終身從事新聞事業，如不可能，願爲公之私人祕書，機關重職，非所勝任。」遂入「時事新報」爲總主筆，主持該報社論。

民國十八年（一九二九年），他四十歲，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；八月，就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兼省府委員。

他在教育廳長任內，除了改進教育外，却以兼省府委員的立場，做了些有益大眾的事。他對浙江的二五減租條例（即後來的三七五減租條例）用了很多功夫，對一些窒礙難行或偏激的部份，以及對地主與佃農的權益，都經斟酌損益，務使能得公平，而浙江實行二五減租條例的「前文」，即爲他所撰。

此外，他常常應蔣主席的電召，攜帶文房四寶，悄然趕往南京，撰寫文字，然後再悄然返回杭州，那

時，蔣主席發表的大文章，多數是他執筆的。於是，有識之士，祇要知道他又趕往南京，就可以預期，蔣主席將要有大文章發表了；一時大家贊許他爲「大手筆」。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〇年）十二月，教育部因爲鬧人事派系，而不得不由蔣主席自兼部長，調他前往相助，担任常務次長（次年再任政務次長兼中央宣傳部副部長）。在任以處理學潮及調整大學教育盡力較多。曾經（一）整頓勞動大學停辦其附設中學；貫徹勞動大學停止招生的命令。（二）平定清華大學風潮。（三）厲行國立院校會計報銷。（四）整頓光華大學。（五）整頓上海法政學院及中法工學院。（六）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學院，調整北京大學組織。

至於中等教育，則以重質不重量爲主；對地方教育行政，則以整理學產及普及小學教育與義務教育爲主。

九一八瀋陽變作，中央宣傳部事務頓見重要，而部長劉蘆隱久不在京，於是陳布雷將教育部之事，移錢昌照次長，而每日到中央黨部辦公，與另一副部長程天放多盡宣傳責任。程負責國外宣傳，他則以宣傳方針的制定與國內宣傳爲主。

此一時期，他也常奉蔣主席之命撰擬特種文件，每日工作，常在十二小時以上，而他係一人在京，未帶家眷，獨居中央飯店三等房，僅自加一書桌，他也居之如飴。

是年十二月十五日，蔣主席爲了促進南北團結，共禦外侮，毅然辭去本兼各職，離京返奉化。陳布雷乃決心共進退。但行政院最後一次會議，却發表他仍回教育廳長之任，固辭不得。遂於次年二月，赴浙接

任。

浙江省財政，以債務支出過多，收支不敷甚大。

民國廿二年（一九三三年）國民政府的概算，本難平衡；而中央方在暗中佈置國防，負擔再增；以致預算會議，久不能決，主席魯滌平憂形於色。陳布雷首倡緊縮之議，自願從教育廳與教育費開始，主張機關經費打八折、教育事業費打九折；而國防建設，則十足支給。於是，其他廳處紛紛贊同，即因此原則，解決問題。

民國廿三年（一九三四年），蔣委員長在南昌行營，事務囿集，政務方面有楊永泰相助，軍事爲熊式輝；惟文字撰述，迄無得力之人；於是邀他前往相助。陳布雷於四月辭去浙江教育廳長，五月前往南昌，任行營設計委員會主任，不親會務，祇司筆扎，留心文化宣傳與理論研究，備蔣公諮詢。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一月，他奉蔣公之命，撰「敵乎友乎」一文，攜往上海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於「外交評論雜誌」，暗示日本，「中國決不可能屈服，日本決不可不認識東亞安危之生計」。希望因此爲日本徬徨無主的國論，開闢新視野，而痛斥野心軍閥的無知，發表以後，各報競相轉載，日本報紙雜誌，也紛紛轉譯，頗能引起海內外的重視，給予日本少壯派精神上的打擊。

入典機要盡瘁竭忠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，南昌行營撤銷，軍委會修改侍從室組織，分設一二兩處：第一處設總務、參謀、警衛三組；第二處設祕書、研究兩組。任陳布雷爲第二處主任，二月，赴漢口任職，兼研究組長。侍從室第二處的執掌，凡是有關黨政各部門，向蔣委員長提出的報告或請示事項，（包括情報在內），都由二處先加整理或加註意見，然後呈核，所以本質上還是蔣委員長的私人祕書。此一制度，在編制上是屬於軍委會的；但真正的性質，歷史上還少見。勉強作一比較，有點像清代的軍機處。

他所執掌的範圍如此之廣，但內部的組織却很簡單，一共祇有五十多人。他的主任辦公室，實際上就是他個人的住宅，祇有兩三個職員，有一位長於書法的金先生，一個辦事務的職員，一個副官。後來才增加一位翁祕書。一直到重慶，都是如此。

侍二處對外不行文，如有必要，用「陳布雷」三字；如以蔣中正委員長名義對外行文，下面註明「侍祕二」等字，大家知道這才是由蔣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發出來的；和其他單位不同。大家遵辦起來，特著效率。

他個性很豪爽，交往的人很多。自從就任侍從室的職務後，一改豪放而爲謹慎，非常嚴肅，親朋的交往也很少了；甚至經常不能回家，也不能應酬，大家自然養成保密習慣。如發生重大事情時，他更能好幾天不下樓，連吃飯都在樓上。

民國廿四年（一九三五年）蔣委員長爲追剿共軍，駐節貴陽，一面籌劃國家大計，召他前往相助，起

草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綱要」。當時人少事繁，尚需親自處理公牘。

十一月，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，他爲蔣公撰重要外交報告，闡明重要而嚴正的立場：「和平未至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至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

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年）十二月「西安事變」，在京要人，均在何應欽家集會，決定召開臨時「中央常會」，由于右任主席，宣讀張學良的荒謬來電，人人憤慨，決議出兵討逆，至夜深三時始散會。接着開「中央政治會議」，照案通過。此後十數日之間，他的繁忙痛苦，徬徨焦憤，難以形容。

當時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爲「中政會」，主席汪精衛、副主席蔣中正均不在京，代祕書長朱家驊爲浙江省政府主席，在杭州；陳布雷兼任副祕書長，不得不負起會議的全盤事務，四位院長的意見，難以一致，使他無所適從，祇有與葉楚滄、陳果夫、陳立夫、曾養甫等人商榷。

他自以身居侍從職員，而獨不能與前方諸同仁共患難；懷念蔣公的近況，憂慮前途的茫茫，每天悵惘，如有所失，和他接近的朋友，深恐他以身殉領袖；程滄波等人，輪流陪伴他。

他雖說憂愁，但爲了營救蔣公，却也不遺餘力，如：

(一)張季鸞與他商量，運用某方面外交力量；他力勸張季鸞在大公報上擁護中央討伐叛逆立場。

(二)與陳立夫、曾養甫聯名勸誠張學良。

(三)代黃埔同學會擬發警告電文。

（四）協同宣傳部策動全國輿論。

此其間，雖然晝夜奔走，睡眠極少；但其一份忠憤耿耿的精神力量，竟能支持其原本弱質的體力。廿五日晚，得蔣公已安抵洛陽之訊，始釋然安眠。

次年二月，再為蔣公撰「西安半月記」。

寧靜致遠淡泊明志

抗戰開始，軍委會擴大編制，設祕書廳，張羣為祕書長，他兼任副祕書長。「中政會」也暫停舉行，改為「國防最高會議」，黨政各部均一體參加，仍以汪精衛為主席，張羣任祕書長，他兼任副祕書長，經常出席會議。

後來改為國防最高委員會，蔣公中正兼委員長，祕書長、副祕書長仍舊。

戰事範圍日廣，各種專門問題，固待搜集材料，分類研究，貢獻統帥；而各方條陳，或請示裁決之件，有時也非先經簽擬，則統帥無從加以審擇決定者。此事，戰前即有人建議組織「智囊團」。他以為中國專家有限，有學問而又能以公正奉職，不植黨羽，不存個人誇耀觀念者更不多。所以他主張延攬有專門學問而又通曉政理者若干人，以備諮詢，或奉交研究審核專門問題，以為獻替。於是，他以此旨趣，請於蔣公，在軍委會內設置「參事室」。

自五月至七月，蔣公籌劃成立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；他奉命準備文字，並參加討論章則，頗費心力。七月，正式成立；他以臨時幹事兼常務幹事。

武漢棄守前，十月廿一、二日，在敵機終日盤旋之下，他奉命起草談話及宣言等文件。當時，侍從室已奉命於廿三、四日以前，遷往湖南，指定在衡山附近集合待命，第一批蕭祕書等於廿一日夜間起程，同仁堅決主張他應隨第一批先行離開武漢。但他因工作未完，正草擬作戰命令，不得不再留一日，於是令座車先行，決定自己改乘小船動身，不料因此引起一場劫難。

廿二日下午五時，他謁別蔣公，傍晚坐小船悄然離開武漢。廿三日下午一時，舟過新堤西十五里許之王家鎮，突遭敵機一再掃射，情勢危急。

他內心鎮定，閉目自持，感念抗戰時期，前後方犧牲衆多；自己生平對國家雖無大貢獻；然而立身行己，差無愧怍。結果，船上有隨員一人、衛士六人、船員二人受傷，船已不能行動。救傷患和繼續趕路，都成問題。

最後，在同仁的努力和當地人民的協助之下，才完成療傷患、葬殉難、修船身、僱船員等事；于廿六日下午五時始到達沙市。

此後，經過衡山、桂林，于十二月七日與蔣公同赴重慶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，汪精衛藉口赴成都中央軍校，而祕密潛往昆明，誘惑龍雲和他發動一次政變，搞「和

平運動」，反對長期抗戰。龍未表明態度，汪乃于廿一日抵達越南的河內。廿二日，日本政府即發出一項「近衛三原則」的聲明，提出了所謂「東亞新秩序」，好讓汪用爲根據，向國內發動「和平運動」。

廿六日，陳布雷奉命撰擬駁斥近衛「東亞新秩序」講詞，爲爭取時間，于一日之內趕撰完成，于廿八日發表。雄偉有力，分析明澈；名報人張季鸞，稱讚爲抗戰期中第一篇有力文字，極具振奮民心士氣的力量。

所以，當次（廿九）日，汪精衛自河內發表響應近衛聲明的主和「豔電」後；不但絲毫不能發生鼓勵人心的效果，反而爲廣大的軍民所不齒。

民國廿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一月，國民黨中央舉行第五次全體會議。於是他撰擬講詞、整理記錄、起草宣言；以及二、三月間撰擬「行的道理」、「政治的道理」、「三民主義之體系與實施程序」，均能在體力精神狀況良好的情況之下，順利完成。此二、三月中，爲他工作最愉快時期。

十二月六日，他五十壽辰，蔣公親筆書贈「寧靜致遠、淡泊明志」八字，爲他祝嘏。

這八個字，本是諸葛亮用來自況自勉的；蔣公以此爲他祝嘏，頗具深意。因爲他輔佐蔣公，真正做到無名英雄的境地，所有工作，都爲蔣公而努力，他每天不分日夜的工作，蔣公隨時都可找到他。他任蔣公機密幕僚長的工作近廿年，始終得到蔣公最高信任，不是僥倖的；而是他有高潔的人格修養和負責的工作態度。

超然立場協和各方

由於陳布雷不常公開露面，引起新聞記者的注意，有位重慶「新民報」的蒲熙修女記者，再三要求陳立夫介紹見他，很冒失的問他屬於國民黨的那一派；他雖然不高興，但却很風趣的回答他說：

「這好比待字閨中的少女，你要問她愛人是誰？她勢必難以回答。我在國民黨中的朋友很多……各方面都很接近。」

他以輕鬆的語調，表示他的超然立場。正因為他的超然地位，所以常能調和各方的意見，而歸到一個核心，所以他的人緣很好。

他的超然地位，是出諸天賦而深厚的人格修養，為蔣委員長股肱多年，從不恃權，也從不向蔣委員長輕易保薦人，搞私人關係。

正因為他能調和各方面的意見，有時還得替蔣委員長解決難題。

當政治協商時期，昆明西南聯大，在共黨外圍「民主同盟」份子鼓動之下，發生學潮，佔據學校，示威遊行，不可理喻。蔣委員長下令陳布雷召集一個小組，包括中央宣傳部、三民主義青年團、教育部等高級人員，為處理中心。問題最嚴重時，蔣委員長下令解散西南聯大，遣返學生回家，由駐軍負責辦理。命令下達後，離渝出巡；教育部長朱家驊也出差在外。

他爲執行此命令，非常慎重。因爲朱部長也離渝，無可商量，如照慣例，奉諭照轉，則此關係各方面的大事，如何圓滿協調，順利執行成功，同時還得體念蔣委員長的苦心，是否真的要解散西南聯大？

他體察當時情形，如果真的要解散西南聯大，則將被共黨及其同路人，引爲口實，在其他各地鼓動學潮；也非處理問題的上策。於是，由他提出小組會議討論，採取下列步驟：

1. 先電呈蔣委員長，請暫緩解散西南聯大。
2. 對學校各方面採疏導辦法：

(1) 暗示各公正教授，最高當局有解散學校與軍事接管的籌劃；爲了學校前途，大家應當挺身而出，疏導學生，不受裹脅。

(2) 策動有家可歸的學生家長，先召回其子弟，等學校復課通知，再行返校。

(3) 通知昆明部隊，作接管學校的準備。

如此多方配合進行，風潮乃告平息，陳布雷處事的謹慎細密與蔣委員長分勞解紛，大多類此。

他的處事，看似消極，其實積極。在重慶的一天，邵毓麟曾問他：「先生對領袖的貢獻，究竟在那裏？」他回答說：

「委員長是全國領袖，繫國家安危於一身。譬如說他是「火車頭」，牽拉着滿載全國軍民長列火車前進，有時速度太快，路基不平，左右顛擺太猛的話，難免沒有危險。我的作用，等於「剎車」，必

要時可使速度稍減，保持平穩。這就是我一點微小的貢獻。」

當行憲開始之時，他于民國三十六年，以二二、八四二高票當選為慈谿縣國大代表，軍委會已撤銷，總統府將正式成立，蔣公有意讓他出任祕書長；他表示自己願任國策顧問。謙讓恬淡，可見一斑。

民國行憲政府成立，他以國民政府委員兼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仍然參與機要，為蔣公的幕僚。

憂國傷時感激輕生

抗戰勝利後，當政治協商時期，我們在政治上正處於不利的形勢，他感到時局危殆。許多黨政同志，爲了私人利慾，不能忍讓團結。共黨的陰謀毒辣心機反覆無常，一般政客的囂張，大出他意料之外。自民國卅四年勝利至卅六年行憲，複雜曲折；政治上種種問題，加以大家對共產黨的眞面目，很少認識，也很少警惕。因此，他始終憂心焦慮，不能忘懷。他曾經向他的胞弟叔同表示：

「從訓政時期過渡到憲政時期，這中間脫了節。」

民國卅七年，共匪猖獗，大局惡化。一年以來，經濟的恐慌、政治的危機、軍事的挫折，嚴重事件，紛至沓來；他本廿年的經驗，很明瞭，這都是過去的結果；同時也更爲當前的危機，憂愁焦急。

當軍事情勢顯明的逆轉，金元券實施後限價政策迅速動搖之際，各方面意見紛紛，多想經由他上達蔣公，祕書蔣君章爲了避免刺激他，都在取得他的信任下，相機處理。可是，有些事，却無法隱瞞他。如當

時食品已造成黑市，鄉間糧物，不再進入城內；城內糧商也囤積不售，加以不肖份子故意搗亂，乃有山西路一帶搶米的風波。人聲吶喊，傳入他的辦公室。他多次在後窗遙望，表情凝重，無語而退。同仁們想盡方法，想讓他開心一下，均屬無效。

因為他的憂，是公憂不是私憂。他的終身之憂，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；而終朝戚戚的，是天下國家之憂，是領袖之憂。

他的體質，本來孱弱，早年因家庭變故，耗費心血；在上海從事報業，日夜辛勞，神經衰弱之症，益見加深。後來從政，擔任蔣公幕僚重任，處理機要。隨時局發展，憂勞益多，經常失眠，每晚全賴服安眠藥，始能入睡。

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一日，國民黨「中央政治委員會」舉行臨時會議，他飽受刺激，回到辦公處所，臉色大變。他鑑於「中朝大官老于事，詎知感激徒媮媮」，決心做一位「感激輕生之士」，而于次夜仰藥殉國了。年五十九歲。

他的老友程滄波先生曾輓他一聯云：

「血淚伴忠魂，江山無恙。」

死生關大計，社稷有靈」相當痛切。他遺有上總統書云：

「介公總裁鈞鑒：

布雷追隨廿年，受知深切，任何痛苦，均應承當，以期無負教誨。但今春以來，目睹耳聞，飽受刺激。入夏秋後，病象日增，神經極度衰弱，實以不堪勉強維持。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，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効命之能力。與其偷生尸位，使公誤計，以爲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，因而貽誤公務；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爲役，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。凡此狂愚之思想，純係心理之失常。讀公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，深感此舉爲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，實無面目再求宥諒。縱有百功，亦不能掩此一眚；況自問生平，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？天佑中國，必能轉危爲安，惟公善保政躬，頤養天和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，而庇護我四萬萬五千萬之同胞。回憶許身麾下，本置生死於度外；豈料今日，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，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。書生無用，負國負公，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。夫人前並致敬意。

部屬布雷負罪謹上。

介公再鑒。

當此前方捷報頻傳，後方秩序漸穩之時，而布雷乃忽傳狂疾，以致不起，不能分公憂勞，反貽公以刺激，實萬萬無詞以自解。然布雷此意，早動於數年之前，而最近亦起於七八月之間。常誦「瓶之罄兮，惟壘之恥」之句，抑抑不可終日。黨國艱危至此，賤體久久不能自振，年迫衰暮，無補危時。韓愈有一「中朝大官老守事，詎知感激徒媿媿」。布雷自問良知，實覺此時，不應無感激輕生

之士。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艱之身，長日同皇，慚憤無比。昔者，公聞葉舉詆總理之言，而置箸不食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亦毒素宣傳，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蔑者，不知凡幾。回憶在渝，當卅二年時，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，而四、五年來，布雷實毫未盡力，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。即此一端，又萬萬無可自全之理。我心純潔質直，除忠於我公之外，毫無其他私心，今乃以無地。自容之悔疾，出如此無悲諒之結局，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。敢爲我公陳之。」

他這封上總統書，不但顯現他感激輕生的一抱負；而且也自然流露出他對蔣公的竭誠忠盡。感人至深。

廉正謹嚴其心如秤

他替蔣公掌理機要，却始終保留一位報人的本色，居政治中樞，而對政治保持客觀的批判精神，處理許多複雜問題，所以蔣公很尊重他，稱他爲「布雷先生」。

他是一個極端謹慎的人，不矜誇、不浮躁，雖然內心有不可踰越的尺度，其人格也有不可侵犯的尊嚴。但待人接物，仍爲書生本色，既無所謂「冷冰冰」，也無所謂「熱烘烘」；廿年中不改常態。

可是，他也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好人。在重慶時，某次開國民黨全會，黃宇人發言失當。他却一改常態的突然起身，義正詞嚴的大聲斥責，頓使全場肅然。

他在蔣公左右綜理機要，由於公務關係，和各方面多所接觸；他却秉持正義，從無偏向。當時，常常有人向他說長道短，希望透過他向蔣公反應。他爲之痛心疾首；而爲我政治前途耽憂，當然，他不會人云亦云的向蔣公反應。

民國卅四年，國民黨六大大會，蔣公希望拔擢些不偏不倚的人才，來担任中委；問他有無適當人選？他爲了不再增加蔣公的困擾，未提一人。

諸葛亮曾說：「吾心如秤，不能爲人作輕重」，正是他畢生行誼的大好寫照。

他的負責精神，也很難能。他的全部時間和精神，都用於爲蔣公分憂解勞的工作方面。無論是在南京、重慶，無論日夜，總是留在一角小樓中，一邊是臥舖、一邊是書桌，幾張普通沙發椅，另外一張高枕沙發，爲他疲勞休息之用。蔣公有電話，便由他自己接。

在重慶時，他的繼配王氏夫人住老鷹岩，他有時返家，一宿即返；在南京時，王氏夫人住上海，他除了體力不支需要休養，以及陰曆過年以外；絕不離京一步。他真可說是沒有私人生活的政府要人。

凡是經過他轉呈蔣公的任何文件，他都很仔細的過目，絕不掉以輕心，有一次，吳經熊替蔣公翻譯聖詠（詩篇），因爲蔣公催索譯稿甚急，而吳事忙，認爲其中「宗徒大事記」比較容易，便託他的某學生代譯，繕抄也不工整。陳布雷就未代轉，很客氣的退回，附一小箋，略述所見。

他操守的廉潔，和克己的功夫，也很少見。他個人的生活，只靠薪水袋和逢年過節蔣公贈送他的特別

程儀，但他仍從程儀中，分一部份獎勵處內同仁。他自己飲食與處內同仁一樣，四菜一湯，都是尋常菜色；同仁們有時替他準備些紅棗燉鷄之類的營養較好的食物，他也不願獨享。但對同仁生活的清苦，甚為關切，常替大家墊付一日伙食費，月終歸墊。可是，當時幣值不穩，月初月終，相差很大。在重慶時，程滄波常在傍晚由上清寺到他的住處，他留程晚飯，叫傭人加菜，每次祇有兩個鹽蛋，這就是他清苦的「憲幕」生活。

抗戰勝利，蔣公知道他生活清苦，曾先後發表他為「中央日報董事長」、「四明銀行董事長」，他均謙辭不就。他易簣之前，蔣君章替他安排遺產，六位公子和二位小姐，每人僅分得金元券三千元。

他是位嚴謹的人，可是有時仍不忘幽默。張道藩和他交誼深切，曾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，後來歷任教育、交通、內政諸部次長，係法國留學生，學戲劇，曾編「密電碼」劇本，從事文藝活動。他特以一聯贈嘲云：

「教育、交通、內政，一次二次三次，是何其次也，豈竟不得已而求其次也？」

國畫、小說、戲劇，心長才長藝長，既無所不長，何妨一搨括子盡其所長。」

張得此聯，非常欣賞，特為書寫於扇面，留為紀念。陳布雷生于國家多難時期，受蔣公特達之知，以儒家的素養氣節，鞠躬盡瘁，忠於黨國，忠於蔣公，最後復以孤憤難抑的情懷，感激輕生，振風俗世；他確是一位代表我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的「國士」典型人物。